

安东尼瘟疫的起源、传播及影响*

——以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的叙述为中心

何立波**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的视角，对发生在2世纪中晚期的安东尼瘟疫进行多维度的考察。古典作家在古希腊—罗马瘟疫的起源问题上形成了“埃塞俄比亚起源说”并广泛流传，这成为雅典瘟疫、安东尼瘟疫、西普里安瘟疫等大流行病的起源想象。罗马军队在两河流域古城塞琉西亚染疫并带回意大利进而蔓延至行省的说法，是古典作品对安东尼瘟疫在罗马帝国暴发和传播的主流叙述；但实际上，安东尼瘟疫可能在西亚各地同时暴发，其传播路线和罗马军队回国路线恰巧重合而已。同时，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对瘟疫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瘟疫的性质、流行状况、政府救助、危害与影响等重要信息，绘就了一幅2世纪中晚期罗马帝国的瘟疫图景。此外，古典作家和基督教知识精英的瘟疫想象，还包括从阿波罗和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到基督教兴起的嬗变，凸显了罗马帝国时期瘟疫书写的宗教色彩。

关键词 罗马帝国 安东尼瘟疫 塞琉西亚 马克·奥里略 盖伦

瘟疫（英文 *plague*，希腊文 *λοιμός*，拉丁文 *pestitis*）是古代史学家用来代指传染性流行病的一个词。实际上，古代的流行病并不都是由疾病引起的。在古代世界，公元前5世纪30年代的雅典瘟疫、2世纪中晚期罗马帝

* 本文获得广东哲学社科规划项目“古罗马人王权意识变迁和晚期罗马多米那特制形成研究”（GD21CWL01）资助。

** 何立波，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教授。

国的安东尼瘟疫^①、6世纪中叶拜占庭帝国的查士丁尼瘟疫，可以说是三次规模较大的瘟疫。其中，雅典瘟疫是古希腊史上的个案，而瘟疫频发似乎是在罗马帝国时期才出现的现象。安东尼瘟疫暴发的2世纪中叶正是罗马的和平与繁荣时期，这一时期被誉为帝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不过在繁荣之下，也隐藏着潜在的危机。尤其是邻近帝国东部的帕提亚帝国在161年一改之前对罗马的和平友好政策，成为罗马帝国在东方最大的敌人，两大帝国之间曾爆发持续数年的大规模战争。在战事即将结束之际，一场大瘟疫在165年底或166年初的两河流域古城塞琉西亚(Seleucia)暴发，被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描述为随返回意大利的罗马军队向西传播，并迅速传遍整个罗马帝国，直到2世纪90年代才陆续结束。这就是罗马帝国历史上著

①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安东尼瘟疫的历史进行了不少研究，有的在通史著作中涉及，有的在瘟疫史、罗马史等著作中谈及；我国学者近年来对这一问题也有关注。早在19世纪，尼布尔就认为这场瘟疫在很多方面是罗马帝国的转折点，参见B. G. Niebuhr,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Rome*, Vol. III, London: Taylor, Walton and Mahery, 1849, p. 251；泽克指出瘟疫使罗马人口损失过半，日耳曼人趁机大量迁入，参见Otto Seeck, *Geschicht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Welt*, Stuttgart: J. B. Metzler, 1910, pp. 398-405；博克认为瘟疫造成罗马劳动力短缺，参见A. E. R. Boak, *Manpower Shortage and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5, p. 19；M. I. 罗斯托夫采夫(M. I. Rostovtzeff)考察瘟疫对罗马军事、经济和起义的影响，但否认人口减少削弱了帝国，参见M. I. Rostovt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374-375；吉里亚姆则认为瘟疫在当时造成罗马帝国1%~2%的人口死亡，参见J. F. Gilliam, "The Plague under Marcus Aurelius,"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73, 1961, pp. 225-252；凯雷斯兹建构了马克·奥里略在瘟疫时期基督教迫害者的形象，参见Paul Keresztes, "Marcus Aurelius a Persecutor?"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Vol. 61, No. 3, 1968, p. 321。在西方全球史研究兴起后，麦克尼尔考察了2世纪地中海文明圈和安东尼瘟疫的关系，参见〔美〕威廉·H.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第95~99页；凯尔·哈珀似乎相信瘟疫的“埃塞俄比亚起源说”，并分析了安东尼瘟疫的流行病学调查因素，参见〔美〕凯尔·哈珀《罗马的命运》，李一帆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第151页；阿伯奇则考察了安东尼瘟疫的性质和死亡情况，参见John Aberch, *Plagues in the World History*, Washington D. C.: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1, p. 73；巴格纳尔对安东尼瘟疫和黑死病进行了比较分析，参见R. S. Bagnall, "The Effects of Plague: Model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Vol. 15, 2002, pp. 114-120。在国内，刘榕榕的古代灾害史研究部分涉及安东尼瘟疫的情况，参见刘榕榕《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区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第56~58页；冯定雄、胡美的《希腊罗马传统中的埃塞俄比亚瘟疫发源地说》(《历史教学》2022年第3期)、王延庆的《瘟疫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齐鲁学刊》2005年第6期)、卢杨的《试论罗马帝国时期的瘟疫对基督教发展的影响》(《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15期)、姬庆红的《古罗马帝国中后期的瘟疫与基督教的兴起》[《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等论文，从不同方面对安东尼瘟疫进行了研究。

名的安托尼瘟疫，它也成为首次在地中海世界范围内暴发和传播的大瘟疫，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流行病事件。^① 这场瘟疫不仅给罗马帝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也引发了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的关注和想象。他们对瘟疫的形成、传播和影响的叙述和记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 2 世纪罗马人在面对大型传染病时的态度、想法和应对措施。

一 古典作家视野下安托尼瘟疫“埃塞俄比亚起源”想象

正如麦克尼尔所说，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从人类瘟疫史来看，人传人的流行病，可能在公元前 3000 年后就已经出现。^② “古希腊医学之父”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 460~前 370 年）的记载表明，古希腊已经存在多种流行病。在公元前 430 年伯里克利（Pericles，约公元前 495~前 429 年）执政时期，雅典暴发了严重瘟疫。罗马史学家李维（Livy，公元前 59~17 年）总共记录了罗马共和国时期的 11 次瘟疫。塔西佗（Tacitus，55~120 年）描写了公元 65 年罗马城的瘟疫，绘就了空气里都是病毒、房屋里堆满尸体、街上到处都是殡仪队伍的瘟疫图景。^③

罗马帝国时期地中海世界交通圈的形成和跨洲、跨文明交通网的构建，带来了疾病传播的可能性。到 1 世纪时，在亚欧大陆形成了中国、印度、地中海等不同文明的疾病圈。原本孤立的文明间出现定期的密切联系和交流后，瘟疫很快开始实现跨文明的传播。^④ 而到罗马帝国时期，世界贸易线路把欧洲、亚洲和北非连接成一个巨大的病菌繁殖场。^⑤ 据罗马博物学家老普

① Kyle Harper, “Pandemics and Passages to Late Antiquity: Rethinking the Plague of c. 249 ~ 270,”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Vol. 28, 2015, p. 223.

② [美] 威廉·H.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第 52 页。

③ [古罗马] 塔西佗：《编年史》下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 575 页。

④ [美] 威廉·H.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第 52 页。

⑤ [美]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 202 页。

林尼(Pliny the Elder, 23~79年)记载,从非洲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到印度普特奥里(Puteoli)的航程,仅仅不到9天,从意大利奥斯提亚港到非洲仅需2天。^①罗马帝国在非洲建立了6个行省,史称“罗马非洲”,其中至少建有500座城市。^②意大利、美索不达米亚和罗马非洲交往密切。在康茂德(Commodus)统治时期(180~192年在位),罗马组建了亚历山大里亚、非洲等运粮船队。^③这些交通路网既意味着贸易的流动,也为流行病传播提供了重要契机。有人把罗马帝国比喻为“蜘蛛网”:罗马就是网中央的蜘蛛,网上任何一个城市暴发瘟疫,其他地区都难逃厄运。^④在帝国境内,罗马城、塞琉西亚、泰西封(Ctesiphon)、安条克(Antioch)、亚历山大里亚等大城市,均多次暴发瘟疫。塞琉西亚位于底格里斯河岸,是塞琉古帝国(公元前312~前64年)最大的城市。古代晚期的希腊史学家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 约330~395年)将塞琉西亚、巴比伦和泰西封并称亚述地区三座著名大城。^⑤罗马帝国便利的交通和频繁的人口往来,带来了瘟疫快速传播的可能性。

不过,古希腊及古罗马古典作家缺乏对瘟疫的清晰认识,取而代之的,是对其起源和传播的“想象”。在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约公元前460~前400或396年)的作品中,最早记载了将雅典瘟疫的起源归于埃塞俄比亚的传说。修昔底德指出:“据说,这种瘟疫起源于上埃及的埃塞俄比亚,由那里传到埃及本土和利比亚,及波斯国王的大部分国土内。”^⑥修昔底德在作品中并未提到罗马人对瘟疫的认识,埃塞俄比亚在1世纪早期与罗马帝国才有了直接接触。M. I. 罗斯托夫采夫认为,埃塞俄比亚的两大城市纳帕塔(Napata)、梅雷在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时期(公元前305~前30年)曾出现明显的希腊化倾向。奥古斯都时期的埃及总督科奈利乌斯·加鲁斯(Cornelius

-
- ①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Vol. 5, p. 423.
 - ② 何芳川、宁骚主编《非洲通史·古代卷》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140页。
 - ③ [美]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3页。
 - ④ 王延庆:《瘟疫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齐鲁学刊》2005年第6期。
 - ⑤ Ammianus Marcellinus, *Roman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Vol. 2, p. 363.
 - ⑥ [古希腊]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137页。

Gallus)率军摧毁了纳帕塔城。^① 1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Strabo)提到奥古斯都豁免了埃塞俄比亚人的赋税。^② 这是古典作家所记载的罗马人与埃塞俄比亚的首次接触。此后,罗马作家琉善(Lucian, 125~180年)提到了雅典瘟疫的传播路径:“这次瘟疫源于埃塞俄比亚,蔓延到埃及,随后传入了一个地域广阔的大国(波斯)并驻留下来。”^③ 这种说法和修昔底德的观点如出一辙。拜占庭史学家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 约500~565年)谈到查士丁尼瘟疫时并未提到其源于埃塞俄比亚,并明确指出其是从埃及传入巴勒斯坦和西亚并最终传播到全世界的。^④ 12世纪的基督教史学家左纳拉斯(Zonaras)认为3世纪的西普里安瘟疫(Cyprian Plague)“从埃塞俄比亚发源,迅速传遍东西方每一块土地”。^⑤ 同时,中世纪的阿拉伯作家也多认为埃塞俄比亚和苏丹是瘟疫之源。^⑥ 直到20世纪,仍有学者支持瘟疫的埃塞俄比亚起源说。罗伯特·S. 格特弗雷德(Robert S. Gottfried)认为该地区人口稠密、环境湿热,更有利于疾病产生和流行,特别是位于尼罗河上游的上埃及地区自古就是地中海疫病发源地;而欧洲和地中海北部沿海地区“普遍寒冷、潮湿,土壤多呈酸性”,不利于农耕,也不易成为瘟疫发源地。^⑦ 弗雷德里克·F. 卡特莱特(Frederick F. Cartwright)和迈克尔·比迪斯(Michael Biddiss)认为,雅典瘟疫源于埃塞俄比亚并传播到埃及,再经过地中海传到比雷埃夫斯和雅典。^⑧ 凯尔·哈珀(Kyle Harper)提出,安托尼瘟疫起源于埃塞俄比亚,通过印度洋

-
- ① [美] M.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431页。
- ② [古希腊] 斯特拉博:《地理学》下册,李铁匠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第1178页。
- ③ Lucian, *How to Write History*, Vol. 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23.
- ④ [拜占庭] 普罗科皮乌斯:《战争史》上册,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181页。
- ⑤ Thomas Banchich, ed., *The History of Zonaras: From Alexander Severus to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the Great*, London: Routledge, 2008, p. 51.
- ⑥ Peter Sarris, “Bubonic Plague in Byzantium: The Evidence of Non-Literary Sources,” in Lester K. Little, ed., *Plague and the End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23.
- ⑦ Robert S. Gottfried, *The Black Death: Natural Human Disaster In Medieval Europe*,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p. 2.
- ⑧ [英] 弗雷德里克·F. 卡特莱特、[英] 迈克尔·比迪斯:《疾病改变历史》,陈仲丹、周晓政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第6页。

世界交通网传播到了阿拉伯半岛。^① 不过,瘟疫的埃塞俄比亚起源说还一直没有科学的定论,将古希腊及罗马时期所有的瘟疫都归于此,未免证据不足。

二 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对安东尼瘟疫起源和传播的叙述

在罗马帝国历史上,涅尔瓦(Nerva)、图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安东尼(Antoninus,亦译为安敦尼)、马克·奥里略(Marcus Aurelius)五位皇帝统治的时期(96~180年),被称为罗马历史上最幸福和繁荣的时代。但在1~2世纪的繁荣之下,也潜伏着危机的暗流。尤其是在马克·奥里略统治时期(161~180年在位),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震撼了整个罗马帝国。在马克·奥里略于公元180年去世之际,罗马帝国已过了鼎盛时期,开始衰退。^②

J. 鲁福斯·菲尔斯(J. Rufus Fears)认为,像美国一样,罗马在中东地区面临严重的外交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安东尼瘟疫源于中东,并由于罗马对伊拉克地区的征服而传遍整个罗马世界。^③ 到1世纪中叶,帕提亚帝国开始推行西进政策,严重威胁罗马东方边疆安全。162年,帕提亚国王沃洛盖苏斯四世(Vologaesius IV, 147~191年在位)开始入侵亚美尼亚和叙利亚。161年,罗马皇帝安东尼去世,马克·奥里略即位,让女婿卢修斯·维鲁斯(Lucius Verus)作为自己的共治者,^④ 并在翌年派维鲁斯出征帕提亚。希腊语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 150~235年)称,维鲁斯征集军队、筹备粮草,并派罗马将军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Avidius Cassius)率军出战。^⑤ 在罗马作家、维鲁斯的老师弗朗托(Fronto)的《书信集》中,收录了维鲁斯于165年给他写的一封信,其中提到“我认为有必要讲清楚在

① 凯尔·哈珀认为,印度洋系统是亚欧大陆各文明疾病的重要源头,中非是各类病原体的摇篮。参见〔美〕凯尔·哈珀《罗马的命运》,李一帆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第132~134页。

② 〔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恺撒与基督》,台湾幼狮文化公司译,天地出版社,2017,第405页。

③ J. Rufus Fears, "The Plague under Marcus Aurelius an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fectious Disease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Vol. 18, No. 1, 2004, p. 69.

④ 〔古罗马〕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第67页。

⑤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Vol. 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p. 3.

我来之前帕提亚人的优势，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战果的辉煌”。^① 165年，罗马军队逼近塞琉西亚。在此之前，古希腊、罗马作家对塞琉西亚有不少描述。例如老普林尼说它有居民60万人，保卢斯·奥罗修斯（Paulus Orosius，约385~420年）和4世纪后期的尤特罗皮乌斯（Eutrophius）都记载该城人口是40万人。^② 面对罗马军队的到来，和帕提亚人素有矛盾的塞琉西亚居民打开城门向罗马投降，罗马军队不战而入城。^③ 不过，狄奥·卡西乌斯又称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焚烧了塞琉西亚城。^④ 他为何以怨报德，古代作家并没有解释。尤特罗皮乌斯的著作记载，罗马人认为，安托尼瘟疫^⑤是从165年罗马军队洗劫塞琉西亚开始的。^⑥ 相关考古资料显示，大约在165年底或是166年1月，塞琉西亚暴发了瘟疫，这从塞琉西亚出土的钱币中能够看到有关记载。^⑦

对罗马军队在两河流域感染瘟疫的情况，马克·奥里略并不知情，仍下令维鲁斯率军返回意大利，而留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在叙利亚担任行省总督。^⑧ 11世纪修道院修士约翰·希菲利努斯（John Xiphilinus）称，罗马军队从塞琉西亚、泰西封撤到叙利亚省的途中，由于瘟疫和饥荒，大量士兵死去。^⑨ 在已经出土的961块罗马军队铭文中，与医疗有关的铭文仅有8块，这也能够解释罗马士兵染疫后的高死亡率。^⑩ 同时，《剑桥古代史》提供了维鲁斯率

-
- ① Marcus Cornelius Fronto, *Correspond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97.
 - ②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Vol. 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69; Paulus Orosius, *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Washington D. 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64, p. 346; [古罗马] 尤特罗皮乌斯:《罗马国史大纲》，谢品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88页。
 - ③ Anthony R. Birley, *Marcus Aurelius*,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140.
 - ④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Vol. 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p. 3.
 - ⑤ 时任罗马皇帝马克·奥里略全名为马克·奥里略·安托尼努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表示他是安东尼之子，因而这场大瘟疫被称为“安托尼瘟疫”（The Antonine Plague）。
 - ⑥ [古罗马] 尤特罗皮乌斯:《罗马国史大纲》，谢品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88页。
 - ⑦ R. H. McDowell, *Coins from Seleucia on the Tigri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35, p. 234.
 - ⑧ [美] 亨利·怀德特·塞奇威克:《马克·奥里略传》，刘招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182~196页。
 - ⑨ J. F. Gilliam, “The Plague Under Marcus Aurelius,”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73, 1961, pp. 231-235.
 - ⑩ Patricia A. Baker, *Medical Care for the Roman Army on the Rhine, Danube and British Frontiers in the First, Second and Early Third Century AD*, Oxford: P. A. Baker and the Publisher, 2004, p. 50.

领军队回到罗马的时间,即166年的夏末。^①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推断,166年夏末罗马城已经出现瘟疫。在此之后,罗马及后来中世纪时期的作家还形成了一种传统观点,即认为是罗马军队将瘟疫从两河流域带回罗马城的。例如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Aelius Spartianus)等明确指出:“维鲁斯的命里似乎注定了要在自己的返程中将瘟疫带入他穿越的那些行省,并最终带到罗马。据说,这场瘟疫起源于巴比伦尼亚。”^②中世纪的基督教文献《阿贝拉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Arbela*)则记载了罗马军队回罗马途中途经叙利亚等地的瘟疫传播情况:“罗马军队在返回的途中遭遇挫折,因为瘟疫如影相随,士兵们难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大幅减员。”^③从《阿贝拉编年史》的记载不难看出,该书作者也认定是罗马军队将瘟疫从两河流域带回了意大利和西部行省。此外,在近现代的西方学者中,持这一观点的也不在少数,只是他们对在塞琉西亚染疫和返回罗马时间的记载,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威尔·杜兰特明确提出,是维鲁斯率罗马军队将瘟疫带回罗马:“维鲁斯带回一个目不可见的胜利者——瘟疫。”^④威廉·沃尔夫·凯普斯指出,166年秋季,罗马军队到罗马城参加凯旋仪式,同时带回了瘟疫。^⑤科瓦略夫也认为是罗马军队带回瘟疫,传遍整个帝国并在意大利和西部行省流行了好几年。^⑥丹尼尔·古列维奇(Danielle Gourevitch)强调安东尼瘟疫源于165年维鲁斯率军返回意大利。^⑦随着瘟疫的传播,高卢、日耳曼和遥远的 not 颠也未能幸免,成为罗马帝国首次大规模流行病事件的参与者。^⑧

安东尼瘟疫的暴发,可能只是在时间上和罗马军队占领塞琉西亚恰巧重

-
- ① Alan K. Bowman, Peter Garnsey and Dominic Rathbone,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65.
 - ② [古罗马]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魏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第97页。
 - ③ A. Mingana, trans., *The Chronicle of Arbela*, Mosul: The Dominican Fathers, 1907, p. 88.
 - ④ [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恺撒与基督》,台湾幼狮文化公司译,天地出版社,2017,第389页。
 - ⑤ [英]威廉·沃尔夫·凯普斯:《安敦尼王朝: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杨洪娟译,华文出版社,2021,第150页。
 - ⑥ [苏]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下册,王以铸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844页。
 - ⑦ Danielle Gourevitch, “The Galenic Plague: A Breakdown of the Imperial Pathocoenosis,”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Life Sciences*, Vol. 27, No. 1, 2005, p. 59.
 - ⑧ Duncan-Jones, “The Impact of the Antonine Plague,”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Vol. 9, 1966, pp. 108-136.

合，人们便将二者联系起来。由于维鲁斯率军从塞琉西亚返回意大利，途中必须经过叙利亚行省，而叙利亚首府安条克正是罗马军队返回意大利所经的第一座大城市。^① 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并列为罗马帝国两座最大的城市，安条克还是罗马在亚洲的行政中心和军事指挥中心。^② 而位于塞琉西亚和罗马城中间的安条克城，当时瘟疫横行，居民大量死亡，一些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认为安条克的瘟疫是罗马军队从塞琉西亚带来的。另外，瘟疫的起源和传播与罗马军队从塞琉西亚向西行进的路线也可能并不一致。

在罗马军队归国前，瘟疫已在两河流域的一些地区出现。据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记载，在安托尼皇帝统治时期的156年，阿拉伯半岛就已经暴发了瘟疫。^③ 在165年罗马军队返回意大利之前，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地区就已有瘟疫出现，只是记载较少而未被人所广泛认知。165年夏，在塞琉西亚出现瘟疫的前夕，著名希腊修辞学家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Aelius Aristides，117~180年）正在小亚细亚旅游胜地士麦那（Smyrna）度假。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是罗马行省城市的精英，他曾在144年来到罗马城，在皇帝安托尼面前发表演说，称赞“伟大的帝国和卓越的力量”。他记载了他眼中所见的该地的瘟疫：“瘟疫几乎让我的邻居们全部丧生。我的几个仆人也感染了，陆续死去。我是最后一个受到瘟疫攻击的，家畜也未能幸免。”^④ 毫无疑问，士麦那瘟疫比塞琉西亚瘟疫出现的时间还要早一些。在小亚细亚著名希腊城市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该地居民在165年曾竖立了一尊献给“避邪者阿波罗”（*Apollo Alexikakos*）的雕像。^⑤ 这表明在罗马军队西归路过此地之前，士麦那、希拉波利斯等小亚细亚地区已出现了瘟疫并存在向阿波罗的献祭活动。根据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的记载，学者C. A. 博尔

-
- ① Glanville Downey, *Ancient Antioch: From the Seleucid Era to the Islamic Conquest*,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02.
 - ② [以色列] 本杰明·艾萨克：《帝国的边界：罗马军队在东方》，欧阳旭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第366~368页。
 - ③ [古罗马] 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第56页。
 - ④ Danielle Gourevitch, “The Galenic Plague: A Breakdown of the Imperial Pathocoenosis,”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Life Sciences*, Vol. 27, No. 1, 2005, p. 60.
 - ⑤ T. Ritti, C. Simsek and H. Yildiz, “Dedicato e Katagrafai dal Santuario Frigio di Apollo Lairbenos,” *Epigraphica Anatolica*, Vol. 32, 2000, pp. 1-87.

(C. A. Behr) 将安东尼瘟疫的发生时间确定为 165 年夏。^①

此外,希腊作家琉善也提到罗马叙利亚行省一个叫尼西比斯(Nisibis)的地方在 165 年出现瘟疫的情况。琉善记录了一位名叫卡尔普尼亚努斯(Calpurnianus)的史学家,此人模仿修昔底德撰写了一部记录维鲁斯对帕提亚人发动战争的史著,其中提到了尼西比斯的瘟疫:“在尼西比斯埋葬可怜的雅典人的时候,我就离开了。但是我深知,我走了以后它会怎么样继续下去。”^②琉善的写作可能发生在 166 年春季或夏季,他应该已经了解了在叙利亚出现瘟疫和传播的情况。

根据古典作家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绘就出瘟疫在西亚的流行图景。塞琉西亚是波斯湾的一个重要贸易中心,波斯商人频繁往来于印度洋的海上航线。瘟疫从波斯湾蔓延到塞琉西亚,再通过回程的罗马军队扩散到各地不是没有可能。但现有的史料显示,瘟疫可能最初并非从塞琉西亚开始。

三 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对安东尼瘟疫蔓延及影响的叙述

对于罗马人而言,安东尼瘟疫是他们之前所没有遇到过的一种新瘟疫。罗马军队的调动、商贸队伍和人员的流动等,都可能推动瘟疫的迅速传播。同时,罗马帝国政府也缺乏应对瘟疫的公共政策和强有力的措施,几乎无法阻止瘟疫的大流行。罗马基督教史学家保卢斯·奥罗修斯,提到安东尼瘟疫在许多行省出现。^③拉丁教父圣哲罗姆(St. Jerome, 约 340~420 年)的《编年史》描写了 168 年的瘟疫,“瘟疫在许多行省发生,影响了罗马”,“这场大瘟疫随后遍及整个行省,罗马损失惨重”。^④尤特罗皮乌斯也说,安东尼瘟疫伴随着地震、洪水和蝗灾,“在罗马乃至全意大利和诸行省的绝大部分居民,连同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因虚脱而死”^⑤。维鲁斯也在 169 年死于瘟疫。根据古典作家的记载,马克·奥里略曾亲临前线,指挥了对日耳曼部落马克曼尼人

① C. A. Behr, *Aelius Aristides and the Sacred Tales*, Amsterdam: Elsevier, 1968, pp. 96-98.

② Lucian, *How to Write History*, Vol. 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23.

③ Paulus Orosius, *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Washington D. 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64, p. 309.

④ St. Jerome, *Chronicle*, London: Croom Helm Ltd., 2005, pp. 287-288.

⑤ [古罗马]尤特罗皮乌斯:《罗马国史大纲》,谢品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 89 页。

(Marcomanni) 的战争。^① 不幸的是，马可·奥里略在 180 年第三次马克曼尼战争中感染瘟疫，七天后死去，终年 60 岁。^② 此外，在 169 年罗马人对日耳曼的战争中，日耳曼人战败。这可能与罗马军团带来的疾病有关，因为许多死在战场上的日耳曼人的身上并未发现有战斗造成的创伤，^③ 可能是被染疫的罗马士兵传染致病而死。

一般认为，安托尼瘟疫在罗马帝国境内蔓延的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马克·奥里略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在康茂德统治时期，该时期暴发的疫情（也有人称之为“康茂德瘟疫”）比前一阶段更严重。关于康茂德瘟疫，罗马史学家赫罗狄安（Herodian，170~240 年）的历史书写非常重要：“就在此时，瘟疫袭击了意大利。罗马城的情况尤为严重，因为像罗马这样的城市吸引了全世界的人，人口稠密。瘟疫肆虐，很多人和与人类密切接触的动物都因此丧命。甚至在医生的建议下，康茂德离开罗马，前往劳伦图姆（Laurentum）避疫。”^④ 赫罗狄安的著作完整存世，对从康茂德继位到塞维鲁王朝覆灭的这段历史记载得非常清楚，对安托尼瘟疫的描述非常重要。

罗马著名医生盖伦（Galen，129~199 年）亲历并记录了安托尼瘟疫。他对瘟疫的描写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因而也有人将安托尼瘟疫称为“盖伦瘟疫”（The Plague of Galen）。161 年，盖伦从他的出生地、小亚细亚的著名希腊城市帕加马（Pergamum）来到罗马城行医，曾任马可·奥里略的私人医生，还为其子康茂德治病。^⑤ 盖伦曾随马可·奥里略参加了对马克曼尼人的战争，亲历了前线士兵感染瘟疫。盖伦发现，罗马城每天都有 1 万人患黄疸，有 1 万人水肿。据他记载，一个年轻人在感染瘟疫初期发高烧，嘴巴和喉咙发炎，口渴异常并且腹泻；第 9 天，他的全身都是黑色的皮疹，

-
- ① 尤特罗皮乌斯认为，马克曼尼战争足以与布匿战争相提并论，因为罗马在此过程中损失极为惨重，参见〔古罗马〕尤特罗皮乌斯《罗马国史大纲》，谢品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 89 页。
 - ② 〔古罗马〕优西比乌：《教会史》，瞿旭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 261 页；〔古罗马〕尤特罗皮乌斯：《罗马国史大纲》，谢品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 90 页。
 - ③ 〔英〕弗雷德里克·F. 卡特莱特、〔英〕迈克尔·比迪斯：《疾病改变历史》，陈仲丹、周晓政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第 11 页。
 - ④ Herodian of Antioch,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p. 20.
 - ⑤ T. V. N. Persaud, *A History of Human Anatomy*, Illinois: Charles C. Thomas Ltd., 2014, p. 40.

“几乎所有得救的人都是这样”；盖伦让年轻人仰面躺下，口服了某种干燥的药物；第10天，他开始咳嗽，身上有了疥疮；第12天，他就能够下床了。^①

此外，基督教史学家也对安东尼瘟疫有较为详细的书写，提供了瘟疫时代的历史图景。尤西比乌（Eusebius，约260~340年，又译为优西比乌斯）详细描述了安东尼瘟疫的发病情况：“瘟疫的特征之一是皮肤呈现红色，且突起形成了疖。这种疾病极度危险，一旦被感染会全身扩散……”^②而根据现代医学研究，高烧、长水痘、皮疹、留疤等是天花的主要症状。此后，麻疹和天花在地中海世界更为普遍，到9世纪在地中海世界和近东就习以为常了。^③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很早就了解了天花。公元前12世纪的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感染过天花，雅典在伯里克利时代也发生过天花。^④近代多数学者认为，安东尼瘟疫实际上是一次天花的暴发，因为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及基督教作家所描述的最明显的症状就是皮疹。^⑤

① Galen, *On the Natural Faculties*, quoted in R. T. Lillman and M. L. Littman, “Galen and the Antonine Plagu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94, No. 3, 1973, p. 246.

② [古罗马] 优西比乌：《教会史》，翟旭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414页。

③ [美] 威廉·H.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第95~96页。

④ John Aberch, *Plagues in the World History*, Washington D. C. :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1, p. 73.

⑤ 麦克尼尔认为，安东尼瘟疫的病原体是天花病毒，参见[美] 威廉·H.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第70页。李特曼父子也认为，有足够理由相信这次瘟疫是天花，因为史料中曾提及患者出水痘现象，参见 R. J. Littman and M. L. Littman, “Galen and the Antonine Plagu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94, 1973, pp. 249-252。伊恩·格里恩与珍妮弗·格林提出，安东尼瘟疫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人传人的疾病，通过飞沫在空气中传播，可能是出血天花，参见 Ian Glynn and Jenifer Glynn, *The Life and Death of Smallpox*, London: Profile Books, 2005, p. 15。唐纳德·霍普金斯认为，安东尼瘟疫的病因就是天花，参见[美] 唐纳德·霍普金斯《天国之花：瘟疫的文化史》，沈跃明、蒋广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27页。格兰维尔·唐尼也指出，发生在165年的瘟疫是天花，后来查士丁尼瘟疫暴发的时候也出现了天花病毒，参见 Glanville Downey, *Ancient Antioch: From the Seleucid Era to the Islamic Conquest*,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02。罗德尼·斯塔克明确指出，安东尼瘟疫是天花首次在西方世界的大规模流行，参见[美] 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黄剑波、高民贵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87页。贾雷德·戴蒙德也持天花说的观点，参见[美]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202页。《剑桥古代史》则比较谨慎，认为“瘟疫的性质不确定，可能是天花、斑疹伤寒或者腺鼠疫”。参见 Alan K. Bowman, Peter Garnsey & Dominic Rathbone,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68。

不过，在记录安托尼瘟疫的知识精英中，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和赫罗狄安均提到瘟疫中人和动物都有死亡，而天花是不会传染给动物的。但盖伦所描述的染疫者的症状，的确具有天花的特征。学者萨拉列斯（Sallares）解释说，人鼠均能够感染天花。他以1967年尼泊尔（Nepal）一个小村庄的小型传染病为例来说明，该村的人和鼠都感染了瘟疫。^①而在黑死病肆虐期间的君士坦丁堡，狗、马、鸟出现了死亡。在佛罗伦萨，狗、老鼠、鸡、鸽子、绵羊、驴、猴子均有死亡。^②之所以在165年出现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当时出现的就是两种不同的流行病。阿里斯泰德和赫罗狄安提到的人和动物都有死亡的流行病是腺鼠疫，而盖伦记载的则是天花。到3世纪前后不列颠发现了黑鼠，这表明在安托尼瘟疫发生前后一段时间内腺鼠疫就已存在。小亚细亚古城以弗所（Ephesus）医生鲁福斯（Rufus）曾在100年左右提到在北非、埃及和叙利亚的腺鼠疫，指出“老鼠和跳蚤这两种载体都出现在了罗马埃及”。^③

同时，诸如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狄奥·卡西乌斯、赫罗狄安、尤西比乌等知识精英，对瘟疫的影响和罗马政府的应对措施均有详细记录。在2世纪中期，与罗马知识精英不同，帝国东部希腊知识精英对罗马帝国历史文化的认同，仍处于艰难的建构期。^④在这一时期，为了应对帕提亚战争、对蛮族人的战争，罗马帝国国库已消耗殆尽，^⑤而瘟疫则进一步造成了严重饥荒，权贵和富人趁机囤积粮食。尤西比乌指出，马克·奥里略最关心的事情有两件——多瑙河前线的战事和帝国全境流行的瘟疫。^⑥这位罗马皇帝将意大利城市的粮食拿出来救济乡村居民，加大了粮食供给量。^⑦马

① R. Sallares, "Ecology, Evolution, and Epidemiology of Plague," in L. K. Little, ed., *Plague and the End of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39-240.

② R. Horrox, *The Black Death*,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6.

③ E. Panagiotakopulu, "Pharaonic Egypt and the Origins of Plague,"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Vol. 31, 2004, p. 270.

④ 吕厚量：《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与2世纪希腊知识精英的历史观》，《历史研究》2021年第5期。

⑤ [古罗马]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第77页。

⑥ [古罗马]尤西比乌：《教会史》，瞿旭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261页。

⑦ [古罗马]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第71页。

克·奥里略还与维鲁斯共同颁布敕令,要求地方政府为居民提供平价粮食。同时,马克·奥里略下令削减开支,限制角斗士比赛,减少免费公共演出,降低演员酬劳。^① 马克·奥里略甚至还拍卖皇宫中的珍奇异宝、御用器皿来筹集资金。最后,为减轻丧葬负担,马克·奥里略用国库资金为穷人提供丧葬费,为死于瘟疫的贵族立塑像,因此赢得了罗马人的爱戴。^② 而到190年,罗马再次出现了严重的粮荒。这既是粮食供给不足的结果,更是由于权贵和富人趁机囤积居奇。皇帝康茂德下令剥夺囤积居奇者的财产,实行粮食限价令,^③ 但并未起到作用。据赫罗狄安记载,克莱安德(Cleander, 时任罗马近卫军长官)囤积了大部分谷物,希望在饥荒之际通过慷慨的救济行动控制人民和军队,从而赢得平民的好感。^④ 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明确指出,把持朝政者侵吞了大量的粮食,这才是罗马大饥荒的根源。^⑤ 狄奥·卡西乌斯也告诉我们,克莱安德将巨额财富送给了康茂德及其情妇,因而罗马人认为康茂德统治的危害超过了瘟疫。^⑥

关于安东尼瘟疫造成罗马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们也有较为详尽的描述。在罗马统治埃及期间,从奥古斯都到165年的一个半世纪中,年均人口增长率约为1%。而在安东尼瘟疫期间,埃及的500万人口减少了10%~20%。^⑦ 178年末,第二波疫情暴发。狄奥·卡西乌斯提供了189年的疫情数据:“罗马城每天都有2000余人死于瘟疫。受到瘟疫感染的不仅是罗马城居民,也包括几乎全部帝国范围内的人。”^⑧ 埃利乌斯·斯巴

- ① [古罗马]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第71页。
- ② [古罗马]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第74~77页。
- ③ [古罗马]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第132页。
- ④ Herodian of Antioch,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p. 21.
- ⑤ [古罗马]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第71页。
- ⑥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Vol. 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pp. 97, 101.
- ⑦ Kyle Harper, "People, Plagues, and Prices in the Roman World; The Evidence from Egyp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76, No. 3, 2016, p. 806.
- ⑧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Vol. 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p. 101.

提亚努斯等提到在马克·奥里略指挥马克曼尼战争期间，“一场严重的瘟疫让数以万计的平民和士兵死去”。^① 李特曼父子认为安东尼瘟疫期间罗马帝国7%~10%的人口死亡率（其中城市和军队的死亡率达到13%~15%）是可信的，并认为马克·奥里略时期瘟疫死亡人数在350万~500万，而康茂德时期死亡人数可达700万~1000万。^② 约翰·阿伯奇（John Aberch）提出，安东尼瘟疫造成帝国境内10%的人口死亡。^③ 我们还可对比近代时期天花疾病致死率的相关数据，如1779~1780年的天花造成墨西哥城16%~18%的人口死亡。^④ 18世纪欧洲60%的人口感染过天花，其中10%的人死去。^⑤ 瘟疫造成劳动力大量死亡，无疑会对社会生产造成重大影响。保卢斯·奥罗修斯描写了瘟疫后的意大利农村画面：“意大利的庄园、土地和城镇荒芜了，鲜有耕种者和居民，到处都是废墟和森林。”^⑥ 爱德华·吉本指出，康茂德时期的瘟疫和饥荒进一步使罗马人的灾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⑦ 著名罗马经济史学家腾尼·弗兰克（Tenney Frank）认为，罗马帝国整个经济结构在马克·奥里略之后已瓦解，罗马人精神生活中的困惑和焦虑也随之蔓延。帝国政府的统摄力和教化力也已失效，各行省只专注于自己的利益。^⑧

最后，安东尼瘟疫削弱了罗马帝国的边疆防务力量，这让罗马的知识精英们感到忧心忡忡。据推算，安东尼瘟疫致使罗马士兵死亡率达到了15%~20%。^⑨ 这也使帝国周边蛮族趁机袭扰边境地区。而席卷帝国的瘟疫和严重

-
- ① [古罗马] 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第76页。
 - ② R. J. Littman and M. L. Littman. , “Galen and the Antonine Plagu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94, No. 3, 1973, pp. 252-255.
 - ③ John Aberch, *Plagues in the World History*, Washingt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1, p. 73.
 - ④ D. B. Cooper, *Epidemic Disease in Mexico City 1761 ~ 1813*, Austi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5, p. 68.
 - ⑤ E. E. Duvillard, *Analyse et Tableaux de l'Influence de la Petite Vérole*, Paris: Medical Heritage Library, 1986, pp. 105-106.
 - ⑥ Paulus Orosius, *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Washing D. C. :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64, p. 309.
 - ⑦ [英]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黄宜思、黄雨石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89页。
 - ⑧ [美] 腾尼·弗兰克：《罗马经济史》，王桂玲、杨金龙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第277、291页。
 - ⑨ [美] 凯尔·哈珀：《罗马的命运》，李一帆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第155页。

的财政危机,使对蛮族的斗争更加困难。166年,日耳曼人的一支伦巴底人(Langobardi)和奥贝人(Obii)率先入侵罗马帝国,其他日耳曼人也纷纷越过莱茵河,有的甚至入侵到了意大利。^①166年末或167年初,罗马的行省潘诺尼亚(Pannonia)也遭到日耳曼人的袭扰。对马克·奥里略而言,日耳曼人是比瘟疫更要优先处理的事务。^②为弥补兵员的缺乏,狄奥·卡西乌斯提到马可·奥里略允许日耳曼人居住在帝国边境,并征募一定数量的雇佣人入伍,退伍后能在达西亚(Dacia)、潘诺尼亚、摩西亚(Moesia)、日耳曼和意大利获得土地。同时,这场战争也让“罗马国库消耗殆尽”。^③爱德华·吉本意识到了罗马军队“蛮族化”的危害:“一支从边民和野蛮人中招募来的雇佣兵是唯一一支保护他们的独立,同时又破坏他们独立的力量。”^④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情况并未马上导致罗马帝国的瓦解;帝国依旧有活力,仍准备在行省尤其是在东方进行扩张,意大利在168年仍能征募到两个军团的兵力。^⑤以潘诺尼亚为例,尽管人口减少和瘟疫影响了征兵,但该省在3世纪的帝国防御中仍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关注的是,在安东尼瘟疫期间,在诺里库姆(Noricum)、下日耳曼等边疆行省的罗马驻军中,出现了涉及军队医疗的铭文,^⑥表明士兵医疗问题引起了政府的重视,这对罗马军队的抗疫是有一定帮助的。

四 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对安东尼瘟疫暴发原因的想象

对罗马人而言,像洪水、地震、火山、瘟疫等这样的自然灾害是人的意志所无法左右的,因而不得不通过超自然的宗教信仰来寻求救赎或帮助。

①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Vol. 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p. 11.

② Anthony R. Birley, *Marcus Aurelius*,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155.

③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Vol. 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p. 11.

④ [英]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黄宜思、黄雨石译,第153页。征募蛮族入伍并非马克·奥里略首创,奥古斯都就曾征募4万名盖塔伊人(Getae)士兵在多瑙河服役,尼禄时代曾征募10万蛮族人在行省服役。

⑤ Alan K. Bowman, Peter Garnsey and Dominic Rathbone,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52.

⑥ Patricia A. Baker, *Medical Care for the Roman Army on the Rhine, Danube and British Frontiers in the First, Second and Early Third Century AD*, Oxford: P. A. Baker and the Publisher, 2004, p. 116.

同时，罗马人经常将自然灾害归结于神的惩处，或者给予神意的解释。安托尼瘟疫就被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解释为神的愤怒和惩罚的结果。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撰写的《罗马君王传》和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的《罗马史》，不仅是罗马史学家对安托尼瘟疫的历史书写，也蕴含了罗马人对这场瘟疫的认识和反思，即瘟疫的暴发主要源于罗马军队冒犯了神的祭坛、对神的亵渎以及他们违反了自己对神的承诺。^①狄奥·卡西乌斯的《罗马史》重点叙述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上叶的历史，成为我们了解安东尼王朝和安托尼瘟疫最重要的史料之一。他叙述了进入塞琉西亚城的罗马士兵受瘟疫和饥荒的影响而损失惨重，被迫撤回叙利亚。他成功塑造了疫情时代马克·奥里略的伟大帝王形象，并对他的银像在176年被罗马城放置到维纳斯（Verus）神庙和罗玛（Roma）神庙、他对士麦那地震的灾后救助、经常看望疫情中的灾民等举动称赞有加。^②

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对瘟疫的叙事，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在古代，人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最先做出的是宗教上的回应。安托尼瘟疫流行时期伴随着蛮族入侵、城市的衰落、帝国行政体系的瓦解等，触及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原始宗教恐惧。罗马此前也经历了多次流行病，但是像安托尼瘟疫这样大规模的流行病还是首次。从来没有一种大流行病能和安托尼瘟疫相提并论，带给罗马人如此大的打击和震撼，以致帝国各地纷纷出现辟邪铭文。^③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记载了马克·奥里略的避邪宗教活动，“用各种方式为罗马城举行避邪（*lectisternia*）仪式”“按照罗马人方式一连七天举行神宴”等。^④马克·奥里略在雅典参加了纪念希腊丰产女神德墨忒尔（Demeter）的厄琉息斯（Eleusis）秘仪，^⑤进一步加深了对希腊—埃及复

-
- ① J. Rufus Fears, “The Plague under Marcus Aurelius an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fectious Disease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Vol. 18, No. 1, 2004, p. 70.
- ②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Vol. 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pp. 55, 57, 67.
- ③ C. P. Jones, “The Dedications ‘to the Gods and Goddess’ and the Antonine Plague,”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Vol. 18, 2005, pp. 293-301.
- ④ 但这些文段中并没有具体提到是哪些神灵，参见〔古罗马〕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第74、81页。
- ⑤ 〔古罗马〕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第84-87页。

合神塞拉皮斯(Serapis)的崇拜。马克·奥里略竭力营造瘟疫系神灵发怒的舆论,对帝国境内的宗教仪式进行监督,以达到净化城市的目的。他还想让人相信瘟疫是由基督教徒拒绝崇拜罗马神造成的。^① 马克·奥里略(又译为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的《沉思录》中瘟疫记载得不多,仅是要求要将动物的瘟疫和人类的瘟疫区分开来,强调要远离不道德的人类的“瘟疫”。^② 弥留之际的马克·奥里略,念念不忘的仍是瘟疫及因瘟疫死去的人们。^③

古典作家笔下的马克·奥里略,显然是得到神佑的。狄奥·卡西乌斯称在马克·奥里略于174年指挥的夸狄(Quadi)战争中,“神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帮助罗马人”,一边是灼热的阳光,一边是瓢泼大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马克·奥里略身边一位叫阿努菲斯(Arnuphis)的埃及巫师,他让很多神尤其是空气之神墨丘利(Mercury)帮助罗马人,因而天降大雨。^④ 与马克·奥里略的敬神相反,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记录了康茂德“劫掠神庙,因此应当被处死”的“渎神”行为。^⑤ 康茂德并非反神庙主义,而是创立了一个“至高的超越一切的朱庇特的”(Jupiter summus exsuperantissimus)以朱庇特为领袖、囊括其他诸神在内的新的世界宗教,反映了罗马皇帝的世界统治者的地位。^⑥

在瘟疫肆虐之下,古希腊的医神阿波罗成为罗马人抗疫的精神工具。雅典人推崇阿波罗,认为提洛岛的阿波罗神庙遭到污染,是因为埋葬死者,所以将坟墓迁到邻近的雷尼亚(Rheneia)岛。^⑦ 李维为我们提供了阿波罗传入罗马的最早时间。他说,这一年(公元前431年)瘟疫肆虐,罗马执

① J. Rufus Fears, "The Plague under Marcus Aurelius an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fectious Disease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Vol. 18, No. 1, 2004, p. 75.

② [古罗马] 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沉思录》,王焕生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第129页。

③ [古罗马] 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第88页。

④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Vol. 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p. 29.

⑤ [古罗马] 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第139页。

⑥ [英] 沃格林:《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谢华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45页。

⑦ [古希腊] 狄奥多罗斯:《希腊史纲》第二卷,席代岳译,文化发展出版社,2019,第736页。

政官根据西比拉 (Sibylla) 神谕, 为消除神的愤怒和消除瘟疫, 建立了罗马第一座阿波罗神庙。这一年虽然有瘟疫, 但是罗马粮食并未歉收。^① 到帝国时期, 阿波罗被进一步与帝国形象联系在一起, 成为最重要的罗马神之一。奥古斯都就曾称自己为阿波罗后裔,^② 并在帕拉丁山修了一座阿波罗神庙。在奥古斯都时期, 阿波罗被人视为太阳, 认为其能够治愈国家和开启新时代。在维吉尔看来, 罗马新时代的特征就是“阿波罗的统治”(Regnum Apollinis)。^③ 贺拉斯也祈祷“愿他(阿波罗)被你们诚挚的祷告所感动, 让可泣可哀的战争, 让悲惨的饥荒和瘟疫, 远离罗马民族和元首恺撒, 飞到不列颠和波斯安家”。^④

正因如此, 不少古典作家认为安东尼瘟疫的出现, 与罗马人对阿波罗神的冒犯有关。例如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的《罗马史》将安东尼瘟疫视为神明发泄不满的一种手段, 认为瘟疫暴发与罗马士兵在塞琉西亚贸然闯入阿波罗神庙有关, 塞琉西亚城也被维鲁斯纵火焚烧毁灭,^⑤ 这直接违反了罗马将军对神的誓言。塞琉西亚的阿波罗塑像被运到罗马城, 放在了帕拉丁山上的阿波罗神庙。据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记载, 罗马士兵通过阿波罗神庙的一处裂缝, 无意进入了迦勒底人 (Chaldaeans, 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 的墓地, 发现了神秘的迦勒底艺术品。瘟疫随之暴发, 从罗马—波斯边界传到莱茵河和高卢, 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感染和死亡。^⑥ 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的看法和阿米安努斯如出一辙, 认为安东尼瘟疫是因为罗马士兵偶然劈开了塞琉西亚阿波罗神庙的金匣子, 疫气 (spiritus pestilens) 才飘出神庙并传遍整个罗马。^⑦

或许是在此种观点的影响下, 罗马境内出现了对阿波罗和阿斯克勒庇

① Livy, *Ab Urbe Condita*, Vol. 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pp. 335-337.

②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Vol. 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p. 409.

③ Virgil, *Eclogues*, Vol. 1, London: W. Heineman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7, p. 196.

④ 《贺拉斯诗全集》, 李永毅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 第 57 页。

⑤ 这件事实际上由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所做。

⑥ Ammianus Marcellinus, *Roman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Vol. 2, p. 363.

⑦ [古罗马] 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 谢品巍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第 97 页。拉丁文本参见 D. Magie, trans., *The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 Vol. 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pp. 222-223.

俄斯(Asclepius)这两位希腊医神的崇拜。安东尼瘟疫首先引发了人们崇拜阿波罗的热潮,并出现了大量的辟邪文字。亲历了安东尼瘟疫的希腊作家包萨尼亚斯(Pausanias, 143~176年),就把阿波罗称为能让他们远离瘟疫的“Alexikakos”(辟邪者)。^①阿斯克勒庇俄斯是阿波罗与塞萨利公主科洛尼斯(Coronis)之子,4世纪的罗马皇帝尤利安(Julian)就认为是“阿波罗诞下了阿斯克勒庇俄斯”。^②“希波克拉底誓言”致辞的对象,就包括阿波罗、阿斯克勒庇俄斯及天地诸神。^③不堪忍受长期的瘟疫和疾病折磨,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转向了崇拜阿斯克勒庇俄斯,认为他能够给自己带来精神的安慰,他对阿斯克勒庇俄斯的虔诚信仰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他在疫情中一度濒临死亡,离开罗马城,来到帕加马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接受治愈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治疗。此外,在罗马非洲行省努米底亚(Numidia)的罗马军营遗址中,就有一尊巨型的阿斯克勒庇俄斯雕像。^④

最后,出于对瘟疫的恐惧,罗马人还试图通过某些神秘宗教及仪式来寻求答案。在他们看来,罗马古老的民族神已经无力拯救人类。他们在迷茫之中转向了神秘的异教仪式,向许多不知名的神献祭品,祈求得到庇护。^⑤罗马宗教缺乏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和恐惧,而东方神秘主义宗教则为罗马宗教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中以能够为经历苦难的人们提供互相友爱、真诚的信念和永不熄灭的希望的新基督教最为突出。到2世纪初,基督教已引起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的重视。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在125年给哈德良皇帝的信中提到,将世界之人分为蛮族人、希腊人、犹太人、基督教徒四种人,^⑥说明基督教徒当时已成为罗马帝国一个有影响的群体。不过在安东尼瘟疫猖獗的时代,基督教也受到了冲击,被认为是瘟疫、饥荒、洪水、干

① Pausanias, *Description of Greece*, Vol. 1, London: W. Heineman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8, p. 17.

② 《尤利安文选》,马勇译,华夏出版社,2011,第75页。

③ 在盖伦17岁的时候,其父尼可(Nicon)曾梦见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并得到指示——盖伦应该学习医学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参见 Galen, *On the Passions and Errors of the Soul*,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57-58.

④ Yann Le Bohec, *The Imperial Roman Arm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248.

⑤ [英]威廉·沃尔夫·凯普斯:《安敦尼王朝: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杨洪娟译,华文出版社,2021,第150页。

⑥ “The Apology of Aristides the Philosopher,” October 25, 2019, <http://www.earlychristianwritings.com/text/aristides-kay.html>.

旱等自然灾害的诱因之一，这种指责在 167 年达到了高峰。^① 正如基督教神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 150-230）所说：“天不降雨，出现地震，发生了瘟疫和饥荒，他们会立即高喊：‘把基督徒投入狮群中。’”^② 而基督徒也以同样理由回应其他宗教的教徒。与此同时，甚至有一些基督徒放弃基督教信仰，转为崇拜阿波罗。

然而，从 2 世纪开始，在古典作品和基督教作品中，基督徒与罗马人逐渐走向了合流的道路。例如用古希腊语写作的古典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和基督教史学家尤西比乌，都采用了视觉化叙事策略，以栩栩如生的描写，记载了基督徒帮助罗马人战胜日耳曼人的故事。狄奥·卡西乌斯明确提到在夸狄战争中，来自梅里特纳（Melitene）的军团分队士兵对基督的崇拜。军团长官趁机告诉马克·奥里略，这些士兵叫基督徒，他们祈求他们的神（上帝）帮助罗马人，他们的神给敌人降下闪电，给罗马人降下雨露。马克·奥里略立即给这些基督徒士兵以嘉奖，将该军团命名为“闪电军团”。^③ 狄奥·卡西乌斯多次在著作中虚构故事，这个“闪电军团”的图景就是其一，很容易被读者识别，但却被尤西比乌所继承并发展。尤西比乌写作的时间比狄奥·卡西乌斯晚了一个多世纪，他试图描述一种“基督徒—雷电—雨露”的故事画面。他所提到的战争是马克·奥里略对日耳曼人、萨尔马提亚人的战争，指出罗马人当时极度缺水。尤西比乌告诉我们，在罗马军队中，梅里特纳军团的士兵们像平常的祷告一样双膝跪地，转向上帝，祈求帮助。更令人吃惊的是，突然间雷电交加，敌人不战而溃，四处逃窜。接着是倾盆大雨，落在那些曾经向上帝祈求的士兵头上，让他们在饥渴待毙的当口变得精神抖擞起来。^④ 尤西比乌的故事版本比狄奥·卡西乌斯的叙述更为详细，他可能是在后者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他构建的基督徒对罗马军队和罗马皇帝庇护的传说，成为关于安东尼瘟疫时代及以后的基督教写作范式。实际上，早期基督教史学并非如个别基督教作家

① Paul Keresztes, “Marcus Aurelius a Persecutor?”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Vol. 61, No. 3, 1968, p. 339.

② [古罗马] 德尔图良：《护教篇》，涂世华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 92 页。

③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Vol. 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p. 29.

④ [古罗马] 优西比乌：《教会史》，瞿旭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 221~222 页。

所宣称的一开始就同希腊罗马的古典史学迥然不同、泾渭分明，也有很多的相似或借鉴，正如狄奥·卡西乌斯、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等希腊知识精英的叙事模式。

在此基础上，2世纪的安东尼瘟疫和3世纪的西普里安瘟疫，被基督教知识精英当作基督教崛起的契机。在对待瘟疫的态度上，基督教认为照顾病人尤其在发生瘟疫之际是其宗教义务，能够给予灾民在其他宗教那里得不到的希望。基督教神学家查士丁(Justin, 约100~165年)强调“我们应对周济穷人，勿对繁华效助”。^①基督教能够赋予生命以新的意义，能够解释灾难现象，宽慰悲痛的人们。基督教知识精英描绘了死去的教徒们在天堂上获得永生的美好画面，为教徒们提供了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支持。基督教将瘟疫形容成教导和试炼，倡导人们应该积极行动，为人们提供了对瘟疫的解释和行为指导。基督教允诺人死后能够复生，还保证给予真诚改悔的罪人以永久的欢乐。基督教的行医布道和救助措施赢得了民心。基督教作家们多次夸耀基督徒在瘟疫面前的相互扶持，却指责异教徒在抛弃病人。西普里安(Cyprian, 200~258年)的书写范式强调瘟疫的两面性，既指出瘟疫的“恐怖而致命”，同时强调瘟疫“彰显了正义，测试了人类的灵魂，因此瘟疫的暴发是多么适宜而又必要啊”，^②在尤西比乌的瘟疫叙事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基督教胜利的合理性。在西普里安瘟疫肆虐的高峰时期，在北非，基督教平均每天为二三百人洗礼。^③对罗马帝国的被压迫阶层而言，这种从容应对瘟疫恐怖和心灵创伤的无与伦比的能力，正是基督教的吸引力所在，也对罗马帝国宗教和文化及其社会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结 语

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对安东尼瘟疫的叙述，为我们了解2世纪时期罗

-
- ① 巫三宝主编《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编》，厉以平、郭小凌编译，商务印书馆，1990，第384页。
- ② Cyprian, *De Mortalitate*, Washington D. 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1933, pp. 15-16.
- ③ [英]弗雷德里克·F.卡特莱特、[英]迈克尔·比迪斯：《疾病改变历史》，陈仲丹、周晓政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第19页。

马人在面对疫情时的社会状况和精神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他们通过对瘟疫源于埃塞俄比亚的瘟疫叙事，塑造了埃塞俄比亚的“世界疾病池”的形象，形成了古代瘟疫写作模式中的“他者”想象。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本人曾在罗马势力的庇护下，沿着尼罗河前往埃塞俄比亚探险考察。而塞琉西亚等西亚交通枢纽所在地，正好成为他们认知中瘟疫从非洲向欧洲传播的枢纽。罗马军队在塞琉西亚染疫后返回意大利，成为很多古典作家对瘟疫向欧洲传播途径的主要认知，构成了古代知识精英瘟疫叙述的重要特点。这种瘟疫叙述范式，对中世纪乃至近代学者都有很大的影响。

首先，古希腊—罗马作品对瘟疫暴发原因的探求，也成为古代知识精英瘟疫书写的重要目的。在他们看来，罗马的政治人物或军队将领在政治或军事活动中的某种不合适的行为，如维鲁斯和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的军队贸然进入阿波罗神庙，引发了众神尤其是阿波罗的愤怒，从而造成了瘟疫的流行。而对瘟疫的恐惧，也使罗马一度极力寻求传统宗教信仰和仪式的帮助。正如罗马共和末年的农学家 M. T. 瓦罗（M. T. Varro，公元前 116~前 27 年）所说，罗马人在面临困境的时候，通常会求教于西彼拉预言书。^①然而，当在面对瘟疫求助于神但未产生应有的效果之后，罗马人逐渐对传统宗教失去了信心。修昔底德指出：“无论是对神的敬畏，还是对于人类法律的恐惧，什么都无法抑制他们的衰颓。”^②面对肆虐的瘟疫，罗马传统的多神宗教无力解决现世的困难，对罗马人乃至帝国广大居民的吸引力在逐渐衰退，诸如对阿波罗等神祇的崇拜走向衰落之势已不可避免。虽然罗马皇帝伽鲁斯（Galus，251~253 年在位）在西普里安瘟疫期间下令帝国居民都要向阿波罗献祭以祛除瘟疫，但仍无法遏制这种趋势。阿波罗的医神功能不断淡化，其作用已经逐渐被局限在了传统的预言神的方面。

其次，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的记载表明，罗马政府对瘟疫的救助政策是有限的，从多个层面都难以再现昔日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在瘟疫肆虐的情况下，古代罗马人需要新的理论和思想对其进行解释；而基督教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兴起并取得蓬勃的发展，基督教史学在这一过程中

① [古罗马] M. T. 瓦罗：《论农业》，王家绶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 17 页。

② [古希腊]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 141 页。

逐渐形成了关于瘟疫的独特写作范式。在传统的古希腊—罗马史学中，人本史观占主要地位，求真精神一直为史学家所孜孜追求。尽管部分史学家并不完全否认神祇的作用，在解释历史时仍将“神意”作为要素之一；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完全是神的奴隶，并不否认人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这正如他们虽然在作品中为神搭建庙堂，但仅在需要时才去请教神。然而，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基督教史学形成了以上帝为世界最高主宰的“神本史观”，从而有了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的瘟疫叙事。

最后，这种基督教和阿波罗等罗马传统神祇的斗争，也表现在基督教知识精英记述瘟疫的作品中。罗马基督教父拉克唐提乌斯(Lactantius, 240~320年)就记载了阿波罗神谕将基督称为“神圣宗教的敌人”，^①以激发基督徒对阿波罗的仇视情节。391年，罗马皇帝提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 346~395年)下令封闭德尔菲神庙，公开的阿波罗崇拜从此在罗马帝国消失了，罗马传统宗教时代结束了，基督教会在瘟疫时代取得了广大社会下层乃至部分上层的信任和支持。对于这一点，不少基督教知识精英颇为自豪，他们的瘟疫叙述竭力营造一种上帝帮助罗马人的印象，以取得罗马人的理解和支持。这或许也成为基督教在安东尼瘟疫尤其是西普里安瘟疫时代赢得广大下层民众信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基督教的这一胜利也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结束和罗马社会转型的完成，罗马世界不再有蛮族人、希腊人、犹太人、基督徒之分，基督存在于全体人民之中。由此，古典时代的古希腊—罗马以人为本的写作范式，也最终为基督教史学的神本叙述所取代。

[责任编辑：刘金虎]

^① Lactantius, *De Mortibus Persecutoru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 114.